

学习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

江小涓， 隆国强， 洪银兴， 潘家华， 刘守英

[编者按]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22年10月16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这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为更好地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国工业经济》编辑部策划了“学习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邀请经济学领域5位知名学者选择不同的视角,畅谈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报告的体会以飨读者。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 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高水平对外开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22)11-0005-21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江小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开放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的二十大的重要内容和关键部署。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1. 经济发展实践充分表明中国选择了正确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114万亿元,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提高7.2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2013—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高于同期全球经济2.6%的增速水平,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8.6%,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2021年,中国GDP达到17.7万亿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国、德国、日本的77.1%、419.9%、359.2%,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突出和稳固。同时,中国人均收入也大幅提高,按照年平均汇率计算,2021年达到12556美元,已经接近人均12965美元这个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中国发展的成功实践,表明坚持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正确性。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从国情出发选择开放之路,促进了中国经济在低起点上实现高速增长。

[作者简介] 江小涓,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 开放初期的大口径外循环: 立足国情的选择

改革开放伊始, 中国的资金、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都很短缺, 同时有五六亿之巨的农村劳动力亟待转移到城镇就业。中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高达 22.4%, 而投资比重仅占 2%, 产业技术全面落后, 可以说劳动力这项要素“畸长”而资源技术这两项要素“畸短”, 此时, 尽可能增加城镇就业、提高人民群众收入水平是这个阶段最重要、最优先和压倒一切的目标。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 国际环境较为宽松, 全球化迅速推进, 大量资金技术在全球寻求投资地点, 为中国创造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发展的时代机遇。因此, 中国构建了大口径的外循环, 以大规模出口为国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以大规模进口为国内提供更多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外循环的地位持续提升,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从 1980 年的 12% 提升到 2006 年的 64%, 开放在促进增长和就业、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国内市场规模和产业体系推动国内循环地位上升

经过四十年高速发展, 中国国内经济体量极大扩张, 经济体系较为完备, 产业水平显著提升。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国内市场规模巨大, 商品消费市场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国内产业体系较为齐全, 特别是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 产业链相对完整。一些代表制造业发展综合水平的产业快速发展, 国际竞争力迅速提升。以汽车制造业为例, 2020 年中国生产乘用车 1999 万辆, 占世界的 35.8%。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强势发展, 2021 年新能源汽车全球产量为 660 万台, 中国生产了 330 万台, 占比高达 50%。中国科技实力极大提升, 研发投入规模已居世界第 2 位, 创新指数世界排名已跃居第 12 位, 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高技术含量产业持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4.7%, 相关服务业发展迅速。企业竞争力明显增强, 中国企业在世界 500 强中的数量, 2011 年超过日本, 2019 年超过美国, 中国已成为世界 500 强企业最多的国家。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和产业体系较为完备的经济体, 近十年来国内循环在增长和就业中的地位持续提升。外贸依存度已经从 2006 年的 64% 回落到 2021 年的 36%,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已经形成。

二、以高水平开放支撑两个循环相互促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 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 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 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 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这些要求表明,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不仅能够通过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有效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还能提升中国开放的质量和水平。中国要继续发展对外经贸合作, 促进全球分工体系的拓展与深化, 推动国内高质量发展。

1. 国内若干重要资源短板更短, 进口是重要补充

中国一些重要自然资源拥有数和储备量与中国人口数量相比明显偏低, 人口占比为 22.13%, 土地和淡水资源占比分别为 7% 和 6%, 石油储量占比为 1.96%。1980 年中国 GDP 占全球比重仅为 1.69%, 和彼时的经济体量相比, 资源供给不算短板, 国内供需压力尚不明显。然而,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迅速扩大, 资源能源消费快速增长, 这些自然资源是天然禀赋, 无法随经济增长而增加供给。于是, 上述各种资源禀赋的数量与中国当下超过 110 万亿美元的庞大经济体量相比, 短板更加突出, 国内供给无法满足需求。因此, 中国要持续加大能源资源节约力度, 提升产业结构, 完善能源消费结构。即便如此, 随着经济总量和能耗总量的快速增长, 国内石油供给缺口逐年递增, 进口持续增长。2000—2019 年中国原油消费总量从 21232 万吨增长到 67268 万吨, 原油进口量从 7027 万吨

增加到50568万吨,占原油消费总量的比重从33.1%上升至75.2%。在目前能源资源生产与消费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阶段,较大规模进口多种能源资源产品,是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个考虑重点。

2. 以国际科技合作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持续提升,日益成为发达国家产业的有力竞争者,加之国际科技与经济合作环境向不利方向的较多变化,继续以引进方式获得大量先进技术的难度在加大。特别是尖端技术市场往往属于寡头甚至垄断性质的技术市场,持有方有较强控制力,与以往中国需要引进的技术不在最前沿、存在技术供给的“竞争性市场”从而可以大量引进的状况已有很大不同。因此,今后技术发展特别是尖端和前沿技术发展,要更强调自主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政府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持之以恒支持原创性研究,为技术创新提供支撑,特别要在关键“卡脖子”技术问题上集中攻关。

同时也要看到,数字时代科技创新出现许多新特点,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多国共同创新网络迅速涌现,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合作的重要新载体和新形态。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全球技术贸易的增长仍然快于国际贸易的增长,特别是依托网络的信息通信技术的跨国交易快速发展,成为全球技术贸易中最重要的部分。目前,中国技术水平普遍提升、产业链日益完整、制造业体系全球最全,可以做出最大限度构建国内产业技术体系的选择。但是,会做的全部自己做并不是一种最优选项,这样的全能产业结构得不到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技术快速迭代和利用全球资源的收益。最近一些年,中国受到的不公平打压增加,国际环境中不友好因素增加,使得在一些领域别无选择,必须自主创新。因此,在分工利益与自主安全的问题上,二者平衡点要向安全的角度迈进一大步,要把安全摆在更重要位置,但是两条脚走路的基本道理和空间依然存在,更多利用国外技术能力,就越能够在高起点上加快推进中国科技自立自强进程。反过来,中国自主创新水平越高,就越能够在更高水平上推进国际科技合作。那些科技发展水平高的科技大国往往也是技术进口大国,只有双向高度参与全球创新链,才能为自己带来最强的技术能力。

3. 以海外投资和当地生产促进国内绿色生产

中国仍然要力争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但模式和渠道需要适时调整。例如,以往主要采用国内生产然后出口这个模式,可以增加产值和就业,但也会加重国内资源能源消耗与碳排放。据研究,工业碳排放占了中国碳排放总量的近60%,而出口商品占了其中相当部分,如果继续保持这种模式,会有较大的环境和碳排放压力。现在中国资本存量巨大,特别是近十年来,国内资金成为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存量资本和每年新增储蓄都达到巨大规模。面对土地、淡水、环境容量等自然资源的日益稀缺,面对日益提高的劳动力成本,相当部分的资金继续在本土配置,会达不到最佳状况,降低资金收益。因此,另一种思路是投资于国外,既为当地带来新的生产就业和增长,也为中国提供更多投资机会和更好投资回报。从趋势看,海外投资较快速度增长将会持续较长时间。

4. 以服务业高水平开放促进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高水平生产者服务对提升制造业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表明,进口高水平研发服务、设计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营销服务等,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从产业特点看,那些生产制造全球化水平高的产业,与其相关的生产者服务全球化程度也高。美国企业中,医药和汽车是制造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也是研发、销售等服务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没有服务业分工深化和形成全球服务网络,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就不可能深化和高效运转。服务贸易中,生产者贸易是增长最快的部分,无论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还是

中国,生产者服务已占全球服务贸易比重的80%以上,为中国发展生产者服务贸易、引进先进服务业特别是研发服务、技术服务、商务服务、营销服务等提供了大量机会,将对中国制造业提升国际竞争力有积极促进作用。特别是数字化全球服务的发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距离影响,降低全球分工成本,从而降低协调和匹配成本,强化当前的全球价值链结构。数字技术还可以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帮助中小企业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

全球化的历史表明,每次全球经济出现较大波动之后,就会有更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组,这正是“好的国家和企业”加快发展的机遇。可以预计,在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全球发展进入“疫后时期”后,全球产业重组会比“正常”时期更为密集活跃,在全球市场上配置的资源更多。国内产业应该以更大力度畅通内外循环,在更多领域中集成全球资金、知识、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加快提升自身技术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

三、保障措施与政策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这些要求表明,中国要继续完善和深化制度型开放,营造国内一流营商环境。

1. 推动制度型开放继续深化与完善

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国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用差别性的政策引导开放。中国的开放政策一直倾向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出,这种倾向性是由中国开放较早时期的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竞争力所决定的。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各种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对中国今后发展都很重要。同样,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扩大开放都很重要,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都很重要,巩固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与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都很重要,原则上没有必要再按行业、区域、出口或进口这些标准制定不同的开放政策。今后要致力于使开放体制更加完善和相对定型,让市场在跨境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增加中国开放体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实现高质量的内外循环融通和相互促进。

2. 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

过去四十年,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的一条重要经验。现在,中国已经加入或者申请加入多个高标准贸易体系,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这些贸易协定涉及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等,都要求继续促进国内市场体系和产业行为向更高水平、更符合国际相关规则的方向推进。要再次利用开放深化的机遇,致力于深化国内改革、维护市场秩序、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大幅减少或取消产业补贴,必要的补贴要提高透明度,符合公平竞争原则。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造假、欺诈等行为。总之,要以更大力度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营造适应高水平开放要求的体制环境。

3. 加快建设国内高水平市场经济体系

国内市场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对开放有重要影响。在较为开放的经济体中,国内基本经济变量失衡和市场扭曲带来的影响超出国界,负面影响被放大。例如,当价格被压低到不能及时反映某种

要素的市场供求和机会成本时,企业就会超量使用,还会大量出口。再如,国内企业可以在国内融资,可以引进外资,还可以到海外投资,如果国内金融业配置资金的效率不能有明显改善,企业的国际投融资行为就会超常发生。只有国内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纠正要素市场上的种种制约和扭曲,为各类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和法制环境,企业才会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做出恰当选择,高效配置资源。

4. 加快构建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近十年来,中国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一是简政放权,为市场主体营造市场化营商环境,包括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商事制度改革等。二是创新监管,包括强化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规范执法行为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检查和干预,以最严谨的标准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安全等领域实施了重点监管等。三是优化服务,为市场主体营造更加便利的营商环境。优化服务体系和流程,政务服务事项基本上在政务服务大厅统一办理,多数事项实现“一窗”分类受理和一次办结。智慧政务平台汇聚1万多项高频应用标准化服务,尽可能网上受理和审批。四是深化开放,营造更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对照世界银行指标和国际先进经验等制定重点改革任务台账,不断缩小与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差距。中国实行外商投资项目负面清单,限制性项目减少2/3,外资企业设立及变更一律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还进一步放宽了金融业、制造业、农业等行业外资准入,中国的全球营商环境排名从2013年的第96位跃升至2019年的第31位,是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之一。中国还优化进出口环节审批管理,提升国际贸易便利化。2021年末,全国进口、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分别较2017年末压缩六成和八成以上。这些成效显著改善了我国整体营商环境,支撑了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畅通和效率提升。

开辟新赛道的战略意义与发展思路

隆国强, 王金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一重大论断和战略部署是站在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为中国未来发展指明重大战略方向,必须深入学习,深刻领会。要充分认识到开辟新赛道的战略意义,准确把握新赛道的时代特征与国际竞争大势,加快研究开辟新赛道的发展思路,谋划好推进途径和政策举措,抢抓历史性机遇。

一、充分认识开辟新赛道的重大战略意义

新赛道是在新技术带动下形成的新兴产业。新赛道之新,不是指别国早已有之而在本国属于“新”产业,而是在各国都属于新兴产业。新赛道将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格局中的地位。

新赛道将引领高质量发展。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持续推进,具有高技术附加值的新赛道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2022年上半年的数据看,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比规模以上工业整体增长率约高6.2个百分点。代表性的新赛道产品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

[作者简介] 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王金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汽车、太阳能电池、移动通信基站设备产量上半年同比分别增长111.2%、31.8%、19.8%。新赛道为中国向产业价值链上游攀升提供机遇。在新赛道上, 中国产业可以依据对技术方向和商业模式的判断, 定义新产品和新生态, 创建自主品牌、建立差异化优势, 提高竞争位势, 推动中国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方向攀升。新赛道也是颠覆性创新的载体, 新兴产业会突破传统工艺的限制, 甚至对现有技术实现“降维打击”, 是中国突破“卡脖子”技术问题的一个途径。

新赛道赋能整体经济的优化升级。新赛道的发展不仅催生新经济, 而且通过对传统产业的辐射和渗透, 加速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例如, 新能源技术日益广泛的应用将推动解决经济增长带来的能源环境约束, 打开经济增长的空间。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应用推动传统产业生产、消费和流通方式的改变, 大幅提升传统产业的效率和竞争力。

新赛道是在大国博弈中实现反超的必由之路。新赛道是国际格局演变的决定性因素, 因而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历史经验表明,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带来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 改变世界的竞争格局。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开辟了新赛道, 一跃成为“日不落帝国”。美国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浪潮中, 把握住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开创出新的赛道, 实现了对英国的超越。虽然中国在现有路径的“追赶”中积累了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完整的工业体系, 但仍面临难以逾越的技术差距, 在传统赛道中长期处于“跟跑”位置。只有在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赛道上取得决定性胜利, 才能够“换道超车”, 实现跨越式发展, 完成从“跟跑者”到“领跑者”的转变。

二、准确把握新赛道的时代特征和国际竞争态势

新赛道是由新一轮技术革命催生的。今天的旧赛道是过去的“新赛道”, 新技术的突破又会带来更新的赛道。由前沿技术决定的新兴产业, 是当下的新赛道。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 有着广泛渗透性的新通用技术创造出了新的机会、新的市场和新的产业, 成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新旧赛道有三种不同的关系。第一种情况是新赛道打败旧赛道。在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增长理论中, 新技术有“创造性毁灭”的特征, 它同时具备“创造”与“毁灭”双重效应。应用新技术经济范式的新兴产业有更高的生产效率, 将会通过“创新竞争效应”打败那些旧的产业, 使那些缺乏效率的产业衰退或消亡。这种持续不断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带来“新旧赛道”的兴衰与更替。新赛道能否出现, 不仅取决于新技术的可行性、可靠性, 而且取决于新技术在经济上的合理性。例如, 当年摩托罗拉的“铱星”计划因为成本过高、用户太少而夭折, 但今天马斯克的“星链”却因为智能手机普及和卫星成本下降而在经济上变得可行。第二种情况是新赛道与旧赛道共存共荣。例如, 太阳能、风电等新能源并没有取代传统的发电, 一些水电站(旧赛道)转化为抽水储能电站, 与新能源这个新赛道共同发展; 电子商务这个新赛道带火了快递这个旧赛道。第三种情况是新赛道改造提升旧赛道, 让旧赛道华丽转身成为新赛道。例如, 服装制造这个旧赛道经过信息技术改造, 转变成为个性化定制服装这样一个新赛道。因此, 在重视发展新赛道的同时, 不能轻视旧赛道。很多新赛道是在旧赛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旧赛道是孕育新赛道的沃土。与此同时, 也要看到, 旧赛道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过于强大, 可能会通过政策游说等多种方式阻碍新赛道的发展。在开辟新赛道时, 一定要处理好新旧赛道之间的关系。

数字化与绿色化加速推进, 催生新赛道不断涌现。数字化与绿色化是技术转型的两大主要潮流。随着以数字技术驱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展开, 一批影响深远的战略性新赛道开始浮现。以芯片和元器件、计算能力、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处于重要突破关口,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成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 将催生出众多产业发展新赛道。低碳转型日益

紧迫,推动绿色低碳技术革命不断深化,推动能源、运输、制造、建筑等领域出现新赛道。例如,能源正在向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方向转型,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储能、动力电池、智慧电网等成为重要发展方向。全球经济发展的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都在朝着数字化和低碳化的方向演进,数字化与绿色化齐头并进,但两者并不是两条不相交汇的平行线,而是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未来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力量将由数字化和低碳化新赛道决定。

新赛道决定未来国际分工格局,围绕新赛道的国际竞争十分激烈。不同国家在新赛道中的地位有明显差别。总体而言,发达经济体处于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的前沿,因此,在新赛道中居于领先地位,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落后地位。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毫无疑问居于领跑者地位,是很多前沿技术的策源地,在前沿技术商业化方面也是独执牛耳。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传统技术上与美国各有千秋,但在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赛道中,整体上落后于美国。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大部分传统技术和产业领域处于追赶者地位,整体规模已经超越,但技术水平、质量等方面与发达经济体尚有差距,在很多新技术领域也处于落后地位。但是,中国具有国内市场规模大、产业体系完整、人力资源丰富、创新投入较大等优势,加之适当的产业政策引导,中国在一些新赛道走到了世界前列,处于“领跑者”的地位。例如,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和风电光伏的装机量,中国均位列世界第一;中国5G领域的专利占全球总数的40%,建成的5G基站数量占全球60%以上。相应地,中国在新赛道培养出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供应链体系。当然,各国在新赛道上的竞争十分激烈,从技术与产业全生命周期看,新赛道只是产业竞争这场“马拉松比赛”的前一段,跑在前面的国家或企业要想一直保持领先地位,一刻也不能放松。稍微落后的国家也完全有机会追赶上去。

产业政策在新赛道的发展与国际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不少新技术在产业化前期面临成本过高、市场接受度不高的问题,许多国家通过财政政策的支持,帮助新产品开拓市场,并通过技术迭代和规模经济,持续降低成本,增强其市场竞争力,真正开辟出产业发展的新赛道。例如,很多国家在新能源发电、新能源汽车产业化早期都提供了财政补贴等多种支持,如果没有早期的政策支持,就不会有新能源发电、新能源汽车今天的进展。另一方面,着眼于在新赛道中抢占优势地位,一些国家大力度实施产业政策。例如,为了在数字经济新赛道上抢占优势地位,美国依照《芯片和科学法》拨款2800亿美元促进本土芯片制造业发展,吸引全球芯片龙头企业到美国投资;欧盟委员会公布《芯片法案》,将投入超过430亿欧元公共和私有资金,用于支持芯片生产、试点项目和初创企业;德国一直力推“工业4.0”战略;日本政府制定了三大数字战略:《综合数据战略》《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2021—2025》和《综合创新战略2021》,还发布《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力图重振半导体产业。为了抢占绿色经济新赛道,美国出台了《通胀削减法案》,投资3700亿美元支持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德国通过了《可再生能源法》的修订;日本通过了《全球变暖对策推进法》。产业政策在新赛道的大力度回归,是这一轮国际产业竞争的新特点,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尤其是美国这样一个领先经济体,如此大力度应用产业政策来抢占新赛道,对世界各国都有很强的示范作用,让新赛道的“内卷”达到一个新高度。一些国家的产业政策不符合现行国际经贸规则,究竟会对国际经贸规则产生怎样的影响,同样值得高度重视。

新赛道是一些发达国家打压中国的重点领域。需要清醒看到的是,发达国家在运用产业政策支持本国抢占新赛道的同时,极力防范打压中国在新赛道的发展。在供给侧,通过出口管制、投资审查、人员限制、科技交流限制等多种手段,削弱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能力。对于中国技术领先的龙头企业,则通过关键设备、核心部件的断供和市场打压等各种手段,在供需双向进行

严酷打压。在谋划中国开辟新赛道工作时,既要看到全球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带来的战略机遇,也要看到一些不友好国家恶意围堵打压的风险,既要有强烈的机遇意识,也要有充分的风险意识,在尽力把握机遇的同时,做好应对各种挑战的准备。

三、开辟新赛道的战略思路和政策体系

新赛道竞争的核心是创新,其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也应围绕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展开。新赛道发展应把握以下思路和原则:

因“道”制宜,分类施策。对不同类型的新赛道要有不同的战略。一是在中国具备了技术领先优势的赛道上,应以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为主要目标,努力创造一个公平竞争、规范便利的市场环境,确保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资源进行创新活动,筑牢已有的国际竞争优势。二是在技术方向尚不明确的潜在新赛道中,主要采取由市场主体试错战略。完善创新创业的体制、政策和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创新型企业、风险投资、创业板资本市场的作用,政府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关注颠覆性技术路线的出现,为企业研究开发和投资提供公共的知识基础。应尽快实现创新技术的产业化,政策上可为技术研发与应用提供支持,通过政府采购、早期使用者补贴、示范项目等措施拉动需求,引导相关行业进入市场化商业化阶段。对这类新赛道的支持仍要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并在技术应用进入规模化阶段时转变为市场主导。三是在技术方向明确、中国处于追赶地位的新赛道中,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有针对性地构建新型举国体制,集聚力量进行引领性科技攻关。对这类新赛道的支持也应尊重市场规律,通过“揭榜挂帅”提高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制胜新赛道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各自优势,关键在于协同二者的功能。市场在发现和处理信息上比政府先行一步,市场机制应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市场的激励下,大量企业在新兴技术路线上试错、竞争与合作,进而开发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而政府在组织协调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新赛道上重大技术创新面临很大的风险或不确定性,应由政府投入的领域,如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政府要加大力度投入,并且要集中稳定地投入,以产生积累性效果。与此同时,通过规划引领、政策引导、财税支持等方式将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协同起来,从而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效率。

自主创新,开放合作。开辟新赛道要着眼参与全球竞争,需要将自立自强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机结合,提高内循环的效率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新赛道上建立起“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领先优势,这与深度参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与合作并不冲突,反而相辅相成。要以我为主,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进开放创新,掌控核心技术与关键环节,但无须追求全产业链自给自足,要通过深化国际分工合作,增强中国在新赛道的综合竞争力,通过相互制约提高产业链安全性。中国在掌握了关键技术后仍要开放竞争,通过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来开展国际贸易,利用中国不断提升的市场、人才和科技优势促进中国新赛道产业的快速发展,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就具体政策而言,要在产业政策、创新体系、金融支持、人才政策、企业发展机制和国际合作上加快建设,培养完善的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一是构建精准备用的产业政策体系。要加强产业规划引导,统筹制定产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既要支持技术研发、人才、配套产业等供给侧,也要重视新赛道的需求侧,如“首台套”产品优先采购、用户补贴等,为新技术产品创造市场。二是建设基础雄厚、开放协同的创新体系。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三个环节同步发力,在战略性、关键性、前瞻性领域建立开放协同的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研机构,保持政府持续稳定的投入。组织实施

重大科技攻关,聚焦关键瓶颈,牵引科技能力的提升。推动公共科研机构开放共享和组织创新。三是进一步提升市场主体的创新激励。增强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动力,在考核机制上将科技投入和产出作为创新型国有企业的重要考核内容。充分激发并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政府在市场准入、研发支持、政府采购、人才培养等方面,要对国有企业和民营市场主体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助力两类主体发挥各自优势、高效协同。四是建立健全培养和激励科技人才政策。加快引进海外人才,以包容和多元化的方式引进领军人才。加快高等教育相关学科改革创新步伐,加快高素质人才培养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畅通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间人才流动渠道。加大人才激励,完善知识产权收益分配制度,推动国有科技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明确国家资助的知识产权归属。五是完善高效协同的现代金融体系。大力发展风险基金、产业基金,改革完善创业板等资本市场,加快内地资本市场与香港资本市场对接合作,加大资本市场对新赛道企业的支持。在新赛道领域可根据需要设立政府主导的相关基金,支持企业发展。六是加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和科技合作。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对于中国有优势、有长板的领域,鼓励企业走出去,抢占全球向绿色低碳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市场机会。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包括开放中国的基础研究,吸引国际研究人员加入,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科技双边合作。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和拓展

洪银兴

党的二十大明确要求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尊重现代化的一般性规律,关注世人普遍认可的现代化一般标准。但是,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会打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阶段的烙印。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指明了现代化的方向,还明确了实现现代化的道路。首先,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和进程不可能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次,现代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发展格局,相应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守正和创新。

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所要推进的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人口达14亿人,占世界人口总量的18.3%。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14亿人口的国家整体实现现代化,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但是要清醒地看到,目前中国的人均GDP才过1万美元。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里,有两点必须考虑:一是目前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已经达到3万美元以上水平。而且这个水平是动态的,到那时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肯定会有更高的水平;二是按14亿人口规模计算,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必须要有更高的GDP总量。这意味着中国要基本实现现代化,需要必要的增长速度。

中国在改革开放开始的30多年中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改革开放解放了潜在的生产力,从而支持了较高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二是在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下,对外开放获得了全球化的

【作者简介】 洪银兴,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红利。进入新发展阶段,一方面由于潜在的增长要素已经得到了充分释放;另一方面对外开放遇到逆全球化的冲击。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在此新常态下推进现代化建设需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要应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也要应对逆全球化的冲击。基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其必要路径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现代化之路。

在新发展阶段推进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还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由此创新的现代化道路可称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拓展,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守正和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体现由理念到发展道路的转化,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现代化的创新发展之路

进入新发展阶段,创新成为现代化的第一动力。创新可以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当今世界正在进入数字经济新时代。依托数字技术的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数字化能使经济社会获得更高质量的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也就成为创新发展的主战场。

创新成为推动现代化之路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现代化的战略支撑。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阻力在于缺乏高端科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称雄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掌握了高端科技。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①科技的自立自强,不仅要避免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而且要占领科技和产业的世界制高点。二是建立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在此基础上的现代化就是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的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关键在于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将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转化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依托原创性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实现新产业的跨越。三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当前的国际竞争主要表现为全球产业链的竞争。一些发达国家为了阻碍中国的崛起,在高科技环节上对中国企业断供,造成多条中国参与的产业链的国外高科技环节“断链”。应对这种挑战,“要以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主导产业为主攻方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②

创新发展的关键是建立有效的科学—技术—产业的转化机制,形成有利于创新成果产业化和市场转化的通道。其路径:一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作用,充分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创新主体作用,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体制。”^③具体体现是建立大学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孵化新技术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推动知识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之间形成互补、协同和合作。二是发挥市场作用,发展完善的技术市场有效转移技术,规范的资本市场有效提供创新投资并锁定创新风险。三是形成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氛围。实现创新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C].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第39、4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C].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第132、133页.

③ 习近平. 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为中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N]. 人民日报, 2018-07-14.

展的动力和资源就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相应地,需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二、现代化的协调发展之路

协调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手段。从现代化角度讲的协调发展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中国要后来居上,决定了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①四化的并联式就是“四化同步”。其明显效果是,相较西方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在时间上大大缩短进程,所付出的代价也要小得多。

2021年,中国的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到7.3%,农业从业人员占比下降到22.9%,城镇化率达64.7%。这意味着,以降低传统农业部门比重为标志的工业化,农民进城意义上的城镇化都已基本到位。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四化”有了新内容:工业化转向工业现代化、绿色化;信息化进入数字化、智能化阶段,并且为其他三化赋能成为协调发展的着力点;城镇化的重点和核心转向人的城镇化,即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与此相应,城镇的城市化、城市的现代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进入新发展阶段“四化同步”的现代化,需要补两块短板。一是补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由原来的非农产业发展带动“三农”,转向直面“三农”本身的发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成为新阶段“三农”现代化的目标。农业强国的基础是农业从弱势产业变为强势产业。这不仅需要农业科技进步,还需要基于三权分置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后的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经营。二是补后发地区现代化滞后的短板。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一方面,后发地区同样需要根据“四化同步”的要求,补工业化的课,补城镇化的课,在信息化(数字经济)上与先发地区进入同一起跑线;另一方面,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要在产业一体化、创新一体化的协调联动中实现现代化;此外,还需要利用国家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三、现代化的绿色发展之路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工业文明时代推进三百多年的西方式现代化,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中国在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推进的现代化,不能走西方式的高投入、高排放的道路。中国所要推进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不能仿效西方待实现现代化后再来解决环境和生态问题,而是一开始就要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的道路,并且贯穿于现代化的全过程。其内容主要涉及:一是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到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治理和改善过去发展所遗留的生态环境问题。二是创新财富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多样性的生物、绿色的环境被视为宝贵的生态财富。与新财富观相适应的经济发展不仅要谋求物质财富,还要谋求生态财富,提供人民美好生活所需要的高质量生态产品。三是明确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双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第24、25页.

碳”达标时间都显著快于西方发达国家同等条件下的时间表,“双碳”目标下的新能源发展和利用会带动科技和产业的革命性变化。

四、现代化的开放发展之路

一个国家只有开放才能成为现代化国家。中国不仅需要在开放中获取资源和市场,更要在开放中获取国际前沿高新技术。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并存。基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强调内循环为主体,决不意味着降低开放发展的作用。无论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都离不开开放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需要更高质量的开放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主要涉及的问题:一是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参与外循环的竞争优势,不能建立在原来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基础上,例如,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要成为国际竞争的优势,就必须如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的那样,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二是开放式创新。发展处于国际前沿、引领产业创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需要充分利用国际创新资源。目前相当部分“卡脖子”技术源自基础研究。要以基础研究的开放式创新为突破口,利用和引进国际创新资源(尤其是创新人才),进行开放式的基础科技创新,创造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科技成果。三是以内循环促外循环。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引技、引智并重;全球产业链环节的国际国内布局并重。四是统筹开放和国家经济安全。既要防范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又要防范逆全球化风险,建立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

五、现代化的共享发展之路

在共享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在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后,现代化新征程要进一步克服相对贫困问题。共同富裕不可能完全消除富裕程度的差距,也不可能简单地拉平收入,更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方面收入差距需要有个“合理区间”,另一方面共同富裕需要分阶段推进,不能一蹴而就。

克服相对贫困既需要改革,也需要发展。针对相对贫困人口大都集中在农村和后发展地区这一现实,要关注农村和后发展地区现代化的跨越;由市场对各个行业的客观评价产生的行业间收入差距,主要靠结构调整和市场调节;由不同行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水平造成的收入差距,主要靠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培训去调节;而由行业垄断和非合理收入造成的收入差距,则要靠反垄断和规范市场秩序来调节、约束和规范。

要在体制上实现效率与公平包容。基本要求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一是初次分配阶段在突出效率的同时要解决好劳动者同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共同富裕问题,涉及两个方面。首先,就业是民生之本,需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其次,在要素报酬的框架内,让劳动者也成为多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体现勤劳和智慧致富。二是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简言之,就是要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相应的制度创新包括:完善劳动力市场等各类要素市场,以教育平等促使劳动者获取知识和技术要素,以营商环境法治化和创新创业环境更加

宽松促使其获取资本和管理收益,以畅通的要素流动为底层劳动者提供改变自己经济地位的要素,提供更多的创新创业机会,营造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环境,使劳动者突破财富继承而靠创新创业致富。

政府在再分配环节更注重公平。政府主导的税收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二是公平提供公共产品。虽然不排除不同家庭存在一定程度的私人产品的差别,但不同家庭享用公共产品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则应该是无差别、公平的。政府要确保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公平且达到现代水准的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体系,使全体人民均等充分享受公共产品。

发挥第三次分配的先富帮后富的作用。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尤其是在救灾、济贫、助学等方面,第三次分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三次分配体现了先富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责任,也是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重要方面。其基础是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慈善文化的弘扬,需要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激励。现阶段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是有限的,需要培育,但相信其作用在现代化进程中会逐渐增大。

总的来说,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也是现代化的一般理论与中国国情结合的道路。这是发展中大国特有的现代化之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净零碳现代化

潘家华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彰显中国特色,引领全球可持续面向未来的现代化。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和水平,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巴黎协定》所规定的“碳中和”即温室气体的人为排放与人为移除达到动态平衡,也就是净零碳,不仅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客观要求,也是可持续现代化的基本保障。净零碳意味着高碳的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有序和最终退出,代之以零碳的可再生能源,所释放的,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可持续繁荣的现代化的动力源泉。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客观上要求净零碳

人与自然和谐,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平衡,自然得以永续,人类得以繁衍。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境况各异,因而人与自然和谐的量化指标和测度,也不会单一均质。人作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一员,生存发展依赖于自然,必须要利用自然,同时也需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地球生命系统与自然形成一种动态平衡,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形成碳水化合物,作为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的能量来源;动植物生长死亡腐化又回归于自然,所谓生态平衡,生生而不息。

农耕文明时代生产力低下,人类依靠绿色植物获取的生物质能和以此为基础的牲畜动能,能源密度低,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级不高,获取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有限。因而,人类在生存繁衍

【作者简介】 潘家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教授。

进程中,即使破坏自然,也是局部的,可逆的。人类进入以化石能源为动能的工业文明时代,能源密度高,动能强劲,人类征服改造自然,引致破坏自然,生态失衡。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不断提升粮食生产力,不断积累物质财富。人类通过技术手段减缓一些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例如,通过终端的污染物去除技术除尘脱硫脱硝,通过筑堤建坝修渠调水实现自然资源的时空再配置。这些工业文明的技术路径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会引发并放大更多的问题。例如,工业文明技术支撑的城市规模扩张,建高楼拓展地上空间,挖地铁开发地下空间,修道路拓展地域范围。建设运营和管理,需要大量的水资源和高品质能源,因而引致资源紧缺,污染严重,宜居性降低,脆弱性增强。例如,北京有限自然空间内降水和太阳辐射能量相对恒定,而北京城市常住人口从1950年的420万人,增加到2021年的2190万人,净增4.2倍。根据北京水务局发布的《北京水资源公报》(2021),北京的水资源总量多年平均只有37.4亿立方米,而且年际波动大,2020年总量只有24.2亿立方米。水资源供需严重失衡。北京地下水的平均埋深,从1960年的3.2米下降到2015年的25.8米。2016年后每年从南水北调可获南水调入10亿立方米,地下水埋深有所回升,2021年地下水平均深度仍低至16.4米。

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工业革命前几乎忽略不计,即使到1950年,全球年排放量也只有50亿吨。2015年之后,年排放量超过350亿吨。大气二氧化碳浓度2021年达到414.7ppm,比工业革命前的280ppm几乎高出50%,高于200万年以来的任何时期。1970年以来的50年是过去2000年以来最暖的50年,1901—2018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了0.20米,上升速度比过去3000年中其他任何一个世纪都快。2011—2020年全球地表温度比工业革命时期上升1.09℃。由于人类化石能源的开采利用,人与自然的平衡和谐已经被打破,而且这种失衡还将持续。即使全球在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全球地表升温的幅度,也可能有50%的概率超过1.5℃^①。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恢复自然生态的系统平衡,需要大幅乃至清零化石能源碳排放。实现净零碳的现实路径,一是“釜底抽薪”,从源头上退出化石能源消费。由于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高达85%,因此,退出化石能源消费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二是采用常规污染物终端去除方法,将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加以捕集,然后或加以利用,或封存于地质构造中,即所谓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由于捕集成本高、利用和封存空间有限,不可能承担净零碳的主体功能。三是碳汇,即植树造林,减少毁林,保护湿地,从而增加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从大气中吸收移除的二氧化碳。尽管原则上碳汇具有气候中性特征,但生态系统保护可以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固碳增汇。因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净零碳,化石能源的有序退出就成为最有效的选择。

二、净零碳是可持续现代化的基本保障

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表观上是高收入水平,实际上是物质财富、生活品质、社会治理的高水平。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功能的发挥,需要消耗常规的化石能源,例如,铁路、公路、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维护,需要消耗高品质的化石能源;生活品质的保障,例如,汽车、交通、供暖空调等,也必须要有常规化石能源的保障。社会治理表观上与化石能源消费直接关联并不明显,但国防、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高品质低成本的化石能源不可或缺。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无论是从总量还是人均水平上,化石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长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原因。

^① 参见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报告。

但是,现代化不是昙花一现的,必须是可持续的,迈向人类未来的。一方面,化石能源是不可再生的,开采燃烧提供经济社会所需的热值后而逸散,不同于铁铜锌等金属和硅磷等非金属可循环再生。工业革命后开始大规模开采使用化石能源,不足300年时间,许多地区的资源已经枯竭或趋于枯竭。目前发达国家的人口规模只有10数亿人,2021年全球人口达到80亿人,到21世纪中叶可望达到100亿人。如果发展中国家因循发达国家老路依赖化石能源完成工业化城市化,有限的化石能源存量是不可能支持人类现代化的。能源是经济社会的血液和动力源泉,直接影响甚至左右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化石能源呈点状分布,极易被资本垄断,成为国际地缘政治争斗的手段,影响化石能源储量有限但需求巨大的经济体。中国化石能源呈“富煤少油缺气”的整体格局,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天然气也严重依赖进口。即使是相对富有的煤炭,2021年中国进口量也高达3.23亿吨,储采比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中国的化石能源开发利用有力支撑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但显然难以保障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更不用说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现代化。而净零碳是去化石能源的进程,彻底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强力、安全而可持续地支撑并保障中国的现代化。

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保护自然,也是净零碳的重要途径和基本保障。农耕文明时代,生产力较为低下,只能通过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的方式,满足人口增长的粮食需求。使得森林、土壤和湿地所固定并形成的自然碳库释放到大气中,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这些措施,不仅是生态保护,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二氧化碳增汇,也可有效提升自然碳库的存量水平。自然碳循环而形成巨大的负碳空间,可以有效地将历史上破坏自然所释放的温室气体固定在碳库。即使是城市绿地、农林牧这些并不形成稳定碳汇的部门,也有着巨大的生物质能生产潜力。农作物秸秆、城市园林废弃物、禽畜粪便,乃至城市生活垃圾,都是碳中性或净零碳的能源资源,构成可持续现代化的基础保障。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天蓝水净。净零碳大体终结了高污染的化石能源开采与燃烧,使得常规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可以大略清零,实现污染物控制的釜底抽薪。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成功,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从源头控制与终端治理双管齐下转向以源头控制为主。2021年,北京PM_{2.5}年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47.7%,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标。取得如此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减煤,从2013年的超过2000万吨减至2020年的100万吨,减幅达到95%。京津冀联防联控,减控对象也是高碳高污染的煤炭。同期,天津、河北减煤幅度也分别超过30%、11%。PM_{2.5}的主要来源是煤炭燃烧引致的排放,另一个来源则是机动车燃油的尾气排放。如果纯电动汽车全面取代燃油汽车,则大气PM_{2.5}进一步下降,有望达到当前欧洲的PM_{2.5}水平。由于可再生能源电力充裕而且自然生态改善,污水经过深度工业处理进而湿地自然净化,净水攻坚也将取得决胜。

三、释放净零碳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物多样性丰富,自然生态良好,人的发展也必须是高品质生活。净零碳进程要求高碳的化石能源为零碳的可再生能源所替代,在就业、增长、民生福祉等方面,净零碳是否能够提供新的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向引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

第一,从就业需求看,化石能源的退出必然减少化石能源行业的就业数量,而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就业也必然相应增加。如果零碳行业的就业量超过高碳化石能源的就业岗位,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就有基本保障。从生产属性看,化石能源具有自然的垄断属性,资本密集度高,机械化

程度高, 劳动就业需求少。传统劳动力密集的煤炭开采, 也为资本技术密集的机械所替代, 而石油开采、炼化, 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更高, 所能提供的劳动就业岗位十分有限。而零碳可再生能源从原材料获取到设备生产、运输安装、运行维护, 生产链条长, 就业环节多, 劳动就业岗位也必然多。例如, 太阳能光伏组件, 从晶硅、晶片、组件, 到生产设备制造、生产过程、安装维护, 技术和资本需求相对较低, 但产业链条长, 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多。风力发电, 从钢铁、风机制造、运输安装到运行维护, 也能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相比于动辄百万千瓦装机容量的煤电, 生物质能由于能源密度相对较低、分散, 因而规模小、分散、就地、就近, 同等规模的装机容量和发电量, 就业岗位远多于煤电。从市场拉动的视角看, 化石能源高度密集的资本投入所产生的高额市场回报, 只会用于投资获取更多的资本收益, 而劳动就业回报, 会用于消费, 拉动需求, 推进经济平稳和谐增长。

第二, 从经济增长和消费福祉提升看, 净零碳有着强劲而可持续的动能。在许多情况下, 零碳可再生能源的生产, 不同于化石能源, 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例如, 农作物秸秆、养殖废弃物、厨余垃圾等, 是社会负产品, 不仅没有产出, 还需要大量的投入对其进行处理而成为社会负担。而生物质气化、生物质发电、生物质颗粒、垃圾发电等, 就可以增加就业, 成为经济的增长源。居民屋顶、墙面太阳光伏发电, 山地、乡野风力发电, 水面鱼光互补, 荒漠、海洋等边际土地或洋面风光利用, 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零碳电力。而产出水平和经济收益, 甚至高于高产农田的市场生产回报。例如, 华北地区居民屋顶安装 100 平方米的太阳光伏发电装置, 装机容量 10 千瓦, 年发电量 13000 千瓦时, 按 0.2 元每千瓦时的电价, 可收益 2600 元。戈壁荒漠一亩地的农业产出几乎为零, 而风光电力生产可获收益至少超过 5000 元。零碳电力的电动汽车, 按每百公里 12 千瓦时电力^①、每千瓦时 0.3 元计, 1 万公里也只有 360 元; 燃油汽车百公里油耗即使按 6.5 升、每升 8 元计, 1 万公里油费也超过 5000 元。按照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数据, 中国千人汽车拥有量 220 辆, 对于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1000 元左右的 6 亿人口, 即使购买燃油汽车, 也难以承受运行费用。这部分人多在乡下, 自有住房屋顶太阳光伏发电, 即可满足包括供暖空调照明汽车在内的家庭用电。这 6 亿人口按千人 500 辆汽车计, 市场容量可达 3 亿辆。这是中高收入群体之外的新增市场, 超过美国、欧洲的汽车市场规模。所带来的增长和消费福祉提升, 是化石能源所不可能实现的。

第三, 零碳可再生能源强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区域、城乡和收入分配三大差距, 尽管呈缩小态势, 但进展缓慢。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零碳可再生能源有着巨大的区域协同和乡村振兴动能。西北无限风光电力、西南巨量水能和抽水蓄能潜力, 为西部增收、生产力优化布局, 提供了巨大空间。2021 年, 中国晶硅产量占全球的 80%, 新疆、内蒙古、青海占中国产量的 75%^②。东数西算, 高耗能高占地产业布局西部, 助推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东部提供资金获取零碳电力, 西部增加就业提升收益。西部东部合作共赢。乡村天地广阔, 风光电力生产, 农民获取低价电力提升福祉, 出售零碳电力给城市工业获取收益。通过零碳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净零碳有效缩减区域、城乡和收入分配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 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① 国务院办公厅 2020 年 11 月 2 日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提出 2025 年新能源汽车百公里行驶里程电耗 12 千瓦时。

② 数据来源: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现代化。

当然,净零碳动能的释放,正如工业生产力对农业生产方式的替代进程一样,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化石能源的动能助推工业化进程而在发达国家实现的现代化,如果从1750年算起,也超过200年时间。20年前,风光电力尚在研发起步阶段,10年前,仍然被称为“垃圾电”。动力电池、压缩空气储能、电动汽车技术,在过去10年,规模扩张和市场竞争能力提速,远快于化石能源技术发展的速度。短短10年时间,光伏发电成本下降90%,风电成本下降超过70%。电动汽车的电池和充电桩,相对于燃油汽车的便捷性,目前仍然处于弱势,但随着电池技术进一步改进、充电设施完善,电动汽车取代燃油车也是大势所趋。有些领域,例如,航空燃油和钢铁冶炼用氢能替代焦煤作为还原剂,可能短时间存在困难,但随着研发投入增加,技术创新也将必定会有新的突破。

中国式的现代化,有着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追求公平正义的共同富裕理念、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幸福标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义担当,以及和平发展的共赢范式。净零碳,就是从高碳化石能源切换到零碳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终端消费赛道,用具有就地、就近、便捷、价廉、安全等潜质的风光水生物质能,替代并市场挤出不可再生、高污染、高度垄断、价格高度波动且昂贵的高碳化石能源。实现净零碳可持续迈向未来的现代化,有着极大的世界意义、普适意义,将推进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提升现代化水平。

高质量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刘守英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明确了,“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建立高标准市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同时中国已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必须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和独特土地制度形成的土地低成本优势,以及土地资本化,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和快速工业化城镇化,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实现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增长减缓带来人口红利下降,“以地谋发展”模式造成的财政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累积,外延扩张产生的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2003年以来,中国土地驱动经济增长、工业

【作者简介】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工程成果(批准号22XNQ002)。

化和城市化的效力减弱,继续沿用原有模式的风险加大,以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增长动能、推动生产函数变革、塑造新的竞争优势成为唯一战略选择。

第二,高质量发展是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的“钥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确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进入新时代,一方面,中国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产业链条、最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科技创新和应用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他们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制约日益增长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关键因素扩展到包括生产发展因素在内的整体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是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这就要求必须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不只要重视量的有效增长,更要注重质的大幅提升。只有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适应科技新变化、人民新需要,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只有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矛盾。

第三,高质量发展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败。实现现代化是各国谋求发展的目标,也是充满荆棘的征途。迄今全球一百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几个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绝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受挫。新近的研究表明,那些取得现代化成功的国家的共同经验是,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转向经济收缩幅度和频率下降带来的经济绩效提高。那些现代化受挫的国家的共同教训是,尽管表现出不间断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其过大的经济收缩幅度和过高的经济收缩频率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绩效持续提高和现代化转型。中国经济发展在经历高速增长以后,已从中低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经济绩效已不再依赖于高速增长引擎,而是取决于防止经济收缩的扰动。经济绩效的表现取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高低。必须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进入新时代,中国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幅提升,经济结构实现根本性跃迁,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现代化国家提供了经验和基础。

二、以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超大人口规模的现代化。在一个超大人口规模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必须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进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畅通,保持合理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改革开放以来,面对资本和科技能力不够,国内需求不足,市场体系不完善,治理能力不强,中国选择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战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对中国快速工业化,成为“世界工厂”,增强中国经济实力,提高全球经济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一方

面,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经济再平衡成为世界经济演变的逻辑主线,产业分工体系和区域布局正在发生广泛深刻调整,经济原有供需循环受到干扰甚至被阻断,应对世界变局的关键在于办好自己的事,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抵御外部风险。另一方面,中国超大人口规模内含超大市场规模,具有不同区域的腾挪和错位发展空间优势,也有利于支撑强大的内需和发展主体性。中国有14亿多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4亿多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是世界上最具有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显著的规模经济优势、创新发展优势和抗冲击能力优势。同时,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制造业体系,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供应链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拥有支撑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强大供给能力。利用和发挥好中国超大规模优势,不仅有利于应对外部风险冲击,而且有利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面对国际国内情势,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必须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把扩大内需作为双循环的战略支点,改善收入分配,优化区域发展,实现城乡平衡发展。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国民经济运行效率,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通过推动形成更加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吸引更高质量的全球资源要素,形成高水平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中国产业升级,提升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的能力与主动性。

三、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支撑高质量发展

一个现代化强国一定有强大的现代经济体系作为支撑。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关键。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就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只有建立起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使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升级,才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只有建立起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构建起新发展格局。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国经济系统各环节、各层面、各领域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有机整体。经济体系犹如一件衣裳,各部分是这件衣裳的布料,缝制和搭配得当,衣裳才能得体。一是建成比较完整协同、更具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培养一批具有全球核心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的产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安全,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二是构建优质高效的现代服务业体系。高质量发展必须建设强大的现代服务业,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使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构建与现代产业体系相匹配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三是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提高基础设施利用和配置效率,增强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四是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实现收入分配合理、社会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高质量发展成果为全民共享。五是建设功能合理、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实现区域良性互动、城乡融合发展,培育和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加强区域优势互补,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六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实施全面节约战略, 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以资源集约利用助推高质量发展。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立足中国能源资源禀赋, 坚持先立后破, 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七是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 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 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稳步扩大规则、机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四、以建设实业强国实现高质量发展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 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 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营造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发展环境和社会氛围。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要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看, 富国与穷国的差距在于产品与产业复杂度的差异, 根本在于内含于产品与产业的知识含量差异形成的比较优势差异, 越是富裕国家, 知识内在于产业和产品的价值越高, 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越多, 越是贫穷的国家则反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为世界制造工厂, 一方面源于廉价和勤劳的劳动力优势和园区发展模式, 另一方面也源于产品复杂度提高, 在国际上具有比较优势产品和产业增加。因此, 必须进一步提高中国产品和产业的复杂度和在全球的竞争地位, 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为企业和企业家创新提供良好环境, 促进新技术、新组织形式、新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 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 培育更多“专精特新”的隐形冠军。切实降低企业成本, 减少行政审批, 优化环保、消防、税务、市场监管等执法方式, 降低企业合规成本, 降低过高的社保缴费率, 降低电力电网交易成本, 降低物流成本。

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充分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 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 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将数字经济全面融合渗透到传统产业, 推动传统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转型升级, 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利用数字技术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整合, 实现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高水平融合。在数字技术核心层进行大量投入, 增强中国在数字技术核心层的自主创新能力。利用数字经济将交易服务转移到虚拟空间, 打破地理区域空间限制,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推动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 提高其他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 提升生产要素的协调力。利用数字技术促进企业采取个性化定制, 柔性化生产, 提高供给质量, 更好满足消费需求。通过数字经济促进消费理念升级, 培养新的消费习惯。

高质量发展必须建设现代化农业强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决定国家现代化成色。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是农业成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短板, 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不同步, 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 农业要素组合失衡, 农业成本高, 影响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与其他产业的竞争力。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推进农业产业革命, 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 提高农业要素生产率, 提高农业要素组合效率,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树立大食物观, 发展设施农业, 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促进乡村与城市两个空间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五、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高质量发展制度保障

稳定的基本制度和高标准市场体制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新时代已经使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定型,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企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必须要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市场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必须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完善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制度体系。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場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場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全面推动中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場,健全城乡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場,加快发展统一的資本市場,加快培育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場。推进市場监管公平统一,健全统一市場监管规则。强化统一市場监管执法。全面提升市場监管能力。体制成本是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性因素,必须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尤其是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場竞争和市場干预行为,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行政性垄断和区域壁垒,清理废除妨碍依法平等准入和退出的规定做法,优化营商环境。

The Talks on Paper of the Study of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JIANG Xiao-juan, LONG Guo-qiang, HONG Yin-xing,
PAN Jia-hua, LIU Shou-ying

Editorial Notes: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held in Beijing from October 16 to 22, 2022. It is a meeting of great importance. It takes place at a critical time as the entire Party and the Chines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embark on a new journey to build China into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and advance toward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planned this conversation to study and explain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ive well-known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wer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of learning the repor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or readers.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pen up new areas and new arenas; high-standard opening up;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JEL Classification: O20 P21 P30

[责任编辑:王燕梅]